

古蜀王國 ——中華文明的搖籃

鞠德源 著



中華蠶桑文明溯源



中國文化發展出版社

China Culture Development Press

古蜀王國

——中華文明的搖籃



鞠德源

華

中華蠶桑文明溯源

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

作者：鞠德源

编辑：刘国芳

出版：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

China Culture Development Press

九龍長沙灣元洲街273-279號泰盛工業大廈6樓615室

Flat 615, 6/F., Tai Sing Ind. Bldg., 273-279 Un Chau St., Cheung Sha Wan, Kln.

电话：852-5395 7835

传真：852-3177 9906

印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62718279

开本：16开

印张：35.5

字数：800千字

版次：2011年4月 第1版

印次：2011年4月 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书号：ISBN 978-988-19887-3-7

定价：RMB 18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蚕赋 战国 荀子

有物于此，儻儻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蚕。



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古蜀王国长江江源文明与夏商周黄河流域中原文明同根同源。古蜀王国统辖地域的蚕桑文明是中华蚕桑文明最本源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最感荣耀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全面展现了周礼制度与历史辉煌。古蜀王国的历史文物所集中突出显现的蚕桑文明、玉文明、青铜文明、驱傩文明、雩祈文明、兵器文明，皆被中国历代王朝所沿袭、传承与发扬，也给周边邻国留下了深远影响，却绝然见不到西亚近东文明东渐古蜀王国之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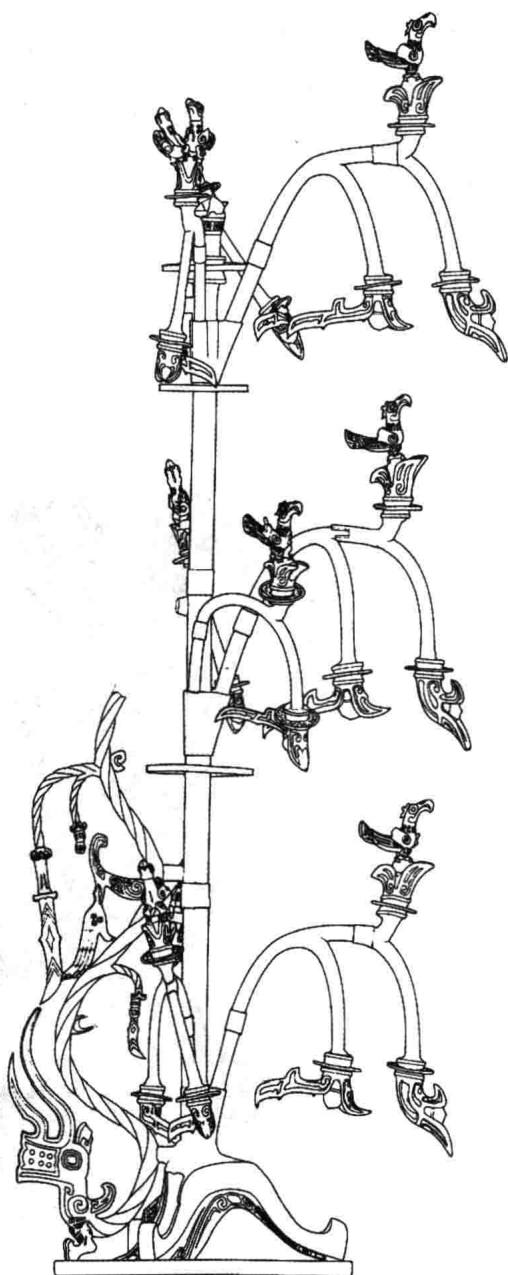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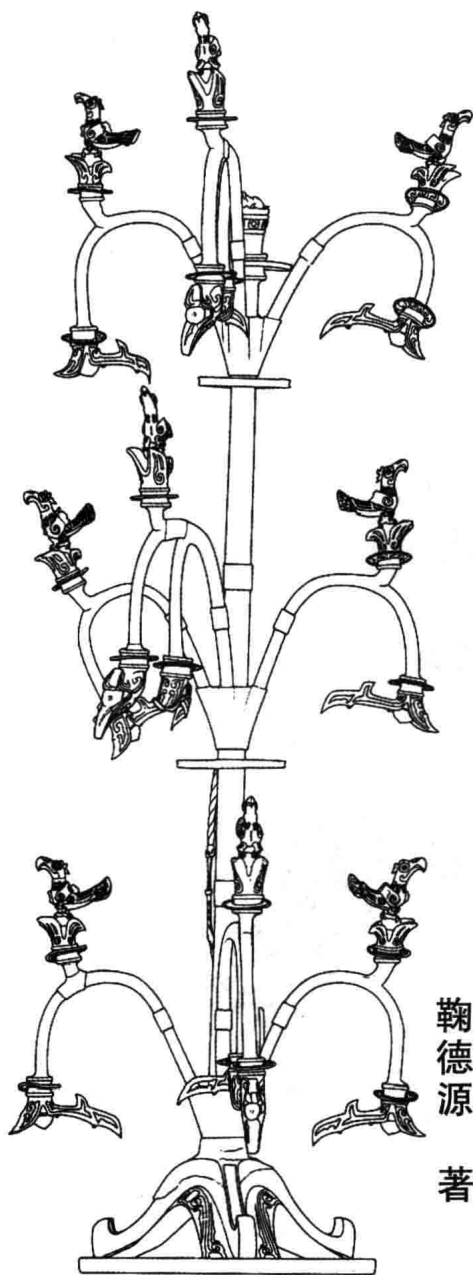
《星经》：“房四星，一名天旗，二名天驷，三名天龙，四名天马。”
《尔雅翼》：“古者后妃享先蚕而后躬桑。先蚕者，天驷也。”

本书出版蒙北京世纪荣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祁先生全力资助，谨此致谢！

古蜀王國

中華文明的搖籃

鞠德源 著



中華蠶桑文明溯源

玲 珑 语

鸟语虫声，总是传心之诀。花英草色，无非见道之文。学者、要天机清彻，胸次玲珑，触物皆有会心处。

——〔明〕洪自诚

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

——〔东汉〕王符

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彫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也。

——〔东汉〕王符

学术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真伪；既真矣，又要辨念头；切不坊向往力，不力，无以空言辄便许人也！

——〔明〕吕新吾

能辨真假，是一种大学问。万古惟有一真字，磨灭不了，盖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风云之所呵护；天地无此不能发育，圣人无此不能参赞。道也者，道此也；学也者，学此也。

——〔明〕吕新吾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者发念之初，便须立此大志愿。然不得虚抱此愿也，务使量包

宇宙，度越古今，满腔真实之心，贯彻于天地万物，无所亏阙，乃为尽性之极功，方成个大学问人。

——〔明〕王塘南

欲成一家言，断宜奋其力矣。夫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见全，得半者其才见半，而又非可矫揉蹴至之者也，盖有自然之候焉。

——〔清〕叶燮

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鹵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

——〔清〕叶燮

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无决隄破藩之识者，未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

——〔清〕刘开

序

自从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发现“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以来，至今已积20余年；2001年又在成都市西北郊发现“金沙村遗址”（分布面积约5平方公里）以来，至今已积10年；两处遗址相距约40公里，同属古蜀王国统治管辖区域以内的历史遗迹。当年两处遗址进行发掘之际，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栏目、《探索·发现》栏目、地方各省卫视和互联网上都相继播放了三星堆、金沙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盛况。此后，相继在广汉、成都、北京、欧洲、日本、台湾、美国、澳大利亚、香港、上海等地公开展览三星堆和金沙两处遗址出土的神奇而辉煌的古蜀王国文物。所谓“震惊天下”、“震惊世界”、“世界第九大奇迹”，“七大千古之谜”之类的炫耀性语辞也屡屡见诸报端；各地方的报刊杂志亦反复刊载三星堆、金沙出土的各种珍稀奇特的文物图片和研究文章；因而在国内外的观众当中和学者中间时常引起“震惊和轰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央视10台《探索·发现》栏目参与《三星堆·消失与复活》、《金沙》等专题片出镜解说的专家学者竟有数十位，他们全凭灵智和奇思妙想进行“群体大解说”，或称“考古大猜想”，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旷古未有之“盛典”。

对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如此这般的考古热播和传媒造势活动，都远远超出了中国境内历次的考古大发现，因而也令四川省各界人士感到振奋，常常引以为荣耀、骄傲和自豪。诚然，三星堆、金沙两处遗址古蜀王国文物的出世，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与之相伴的是在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兴起了“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热”、“金沙文明考古研究热”，涌现出众多的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学者、金沙文明考古研究学者和少数出类拔萃的考古学官精英，《三星堆大猜想》和《从三星堆到金沙》之类的“三星堆考古著作”、“金沙考古著作”，充斥于最热门的图书架阁之中。

然而，作为无冠盖的“北京闲民”和“旁观者”，每当我仔细品读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学者和金沙文明考古研究学者的大论文章或鸿篇钜制之后，或者洗耳恭听中国考古学界各方专家精英为央视10台《探索·发现》栏目反复热播的《三星堆·消失与复活》和《金沙》等专题片所发表的新益求新的解说词和各种“震惊世界”与“惊世骇俗”的奇谈高论之后，总是感觉愈看愈糊涂，愈听愈震惊，如陷五里雾中！而涉及古蜀王国最根本的历史定位问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仍然疑问重重，玄机重重！人们无法具体得知古蜀王国文明到底是何方文明？大青铜树是何类何名之树？与古蜀国人有何种经济利益关系？大小青铜立人像是何方人氏？是人是神？是男是女？“大手结”之姿势有何用途？古蜀人为什么要隆重地崇敬她？各种黄金四目青铜头面具和青铜兽面具有何用途？对中国后世社会有何意涵与影响？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自然构成的联结紧密的“文物链”所包括的青铜

鸟族、各种玉器、各种青铜器的名称、规制与周礼制度有何种渊源关系和具体用途？金沙出土的青铜人头、石人、石虎、石蛇及其涂朱的原始本义与真实用途到底是什么？金沙遗址出土的所谓“太阳神鸟金饰”到底是何种名鸟？是乌是鸛？是鹄是鹤？为什么会具有摩天绕日旋飞本能？被中国考古文物界五位泰斗级权威和专家精英们联名鼎荐为“金乌负日”并被正式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是否属于“科学考古鉴定”还是“群体大蒙人”？古蜀王国长江江源文明与夏商周黄河流域中原文明有无亲缘关系？古蜀王国是否是中华文明原始肇迹之地域？等等。所有这些重大的考古疑难问题，几乎皆被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学者、金沙文明考古研究学者之中的少数考古学官精英给“全盘巫化”了，导引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考古学术研究出现了罕见的“脱轨”现象，致使古蜀王国文明的历史定位问题遭遇了严重扭曲。

有鉴于此，深感有必要以无冠盖的“北京闲民”暂时寄身于“旁门”，试着做一点古蜀王国文明的学术研究，去破解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链”和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链”的历史谜团，为古蜀王国文明与历史定位问题说说历史真情，为古蜀王国的蚕桑文明正名，为三星堆文明正名，为金沙文明正名，并借此机会求教于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考古爱好者。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精美绝伦的大小青铜树、大小青铜立人像，以及所有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历史遗物，构成了有序的、连结紧密的、相互陪衬的“文物链”，全面系统地充分有力地展现了古蜀王国的蚕桑文明，真实有据地证明古蜀王国是中华文明与中华蚕桑文明最本源的发祥地，故本书取名为《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并以古蜀王国蚕桑文明为中心主题，主要考证论述六个方面：

首先，所谓“大青铜神树”，既不是“若木”，也不是“建木”，更不是“扶桑”，而是自蚕丛王以来所建植、开发、利用的桑柘树，是蚕赖以生存的桑柘树，是中华蚕桑文明发祥之树。绝对不是三星堆学者所反复攀附的西方各种“神树”，证明三星堆学者所定名的各种树木之名，都远离了古蜀王国的历史实际。

其次，“大小青铜立人像”，既不是“群巫之王”或“群巫之长”，也不是“大力人”或“大力神”，更不是犹太人的“变种”，而是古蜀王国为后妃等举行亲蚕躬桑礼仪制度而特制的“蚕神”（菀窳妇人、寓氏公主）替身的铜像。大铜人她的头冠头饰与所穿的衣与裳，和服装上所展示的图画，都显示了蚕衣的样式，立人像所做的“大手结”姿态与势位（三星堆学者形容为抱拳手势，从来没有用过“大手结”一词），是作为接收后妃及助蚕者献桑之用。这尊大青铜立人像头戴“剪髻菌冠”与踝骨以上戴有“脚镯”，她所显示的是女性塑像，亦绝对与西亚各国的所谓“铜人像”没有任何同缘关系，相反地却与中原内地夏商周三代的蚕桑文明有着最直接的亲缘关系。

第三，所谓的“青铜头像”和“兽面具”，既不是“巫祝”，也不是“祭祀”戴的面具，更不是上帝、鬼神、祖先灵魂的“中介”，亦绝对不是部落首领之头像，而是古蜀王国举行

驱傩活动所使用的戴有“黄金四目”的傩面具。此项驱傩活动与中原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驱傩活动有着更直接的亲缘关系，对周边地区的方国族群和四邻及中夏的后世各代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古蜀王国以圭、璧、璋、琮为代表的玉文明，从最古老的礼仪制度上及其种类用途上都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玉文明保持着最协同一致的亲缘关系，不仅在种类形制上、用途上和制作技艺上处处契合，而且更有自己独秀的古蜀王国的特色。特别是以玉琮为代表明显地显示出长江上游的玉文明与长江下游的玉文明有着最直接的源流关系。

第五，古蜀王国的以尊、罍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与以青铜鸕版、青铜盾牌及青铜旗铃为典型代表的兵器文明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以及周边地区的青铜文明更是处处显示着同根同源之关系。

第六，古蜀王国所属金沙地方，所有出土的巫觋石人像、男女旱魃青铜头身像、金蝦蟆、石蛇、石虎、青铜鹰鸟、四鹤摩天绕日旋飞金箔制天盘（绝对不是“金乌负日”造型）、青铜“璋邸射”（有领三鸟环形器），以及玉璧、玉璋、玉瓚等，构成大雩祈雨的“文物链”，都是古蜀王国举行大雩祈雨仪式之后的瘞埋物。这些实物证据有力地表明，古蜀王国的统辖地区曾经发生过异常罕见的大旱，蜀国人曾举行过，并被中原夏商周王朝仿行过的大雩祈雨的礼仪制度。并且随着古蜀国蚕丛族裔、杜宇族裔向美洲的大迁徙，也将这种祈雨仪式带到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等地方，今天已经可以从中美洲墨西哥月亮金字塔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实物中找到同根同源的确凿证据。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不难看出，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学者对古蜀王国的历史定位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仍处在一种游离混沌状态，特别是杂糅进来的“西亚近东文明东渐（古蜀国）”之说，完全掩盖了长江江源地区古蜀王国文明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文明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这是当今三星堆文明研究中的最关键的历史问题，直接关系中华民族文明源流问题，值得我们清醒头脑、理顺思维逻辑，进行严肃的考古反思，绝不应该满足于最初阶段的“群体大猜古”的热闹局面，而错断古蜀王国文明的历史。

拙著《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一书，虽属无冠盖的“北京闲民”的学术“客串”之作，但我确信它是一部全新解读古蜀王国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为中华文明原始肇基正名，为古蜀王国蚕桑文明正名，为古蜀王国历史定位问题正名的正本清源之作。因此与以往三星堆研究学者的考古论著相比，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本书在篇章结构上、论题设置上以及在论证方式和行文体例上，独守考古传统之特色。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作出“文物链”的归类诠释，不是停留在单个器物的外观描述上，而是着眼于具体功能上，即出土文物的原始用途与本义上，故需旁徵博引，上下勾连，古今互证，特别解明与中原文物制度之关系，故自成独家特有之作。

二、本书在学术上独辟蹊径，全面地、系统地 and 具体地解明了古蜀王国所有涉及蚕桑文明“文物链”上的每一件实物的细节，因而解明了“大青铜桑柘树”与“鸟”族的关系，

与虞人的关系，与“辫索状马首龙身”及“大臂手”之关系，以及与古蜀传说之关系，同时也解明了大小青铜人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他们的头饰、服饰与中原夏商周以来的传统文明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解明了古蜀王国的“天驷驮载祭先蚕躬桑坛飨祀礼仪”（即所谓“神坛”），是凸显古蜀王国蚕桑文明最高智慧与结晶的青铜工艺造型。

三、本书不是孤立地只限于古蜀王国本身的文物制度上，而是与周边相邻地区、中原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有机地解明了古蜀蚕桑文明与中原蚕桑文明之关系。应该指出，古蜀蚕桑文明是中华农桑文明之中的第一文明，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与传承，更加值得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认真地进行历史溯源。多年以来我们反复宣扬的是“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对丝绸之本源即中华蚕桑文明，却没有给予足够的研究和重视。因此，借本书出版之机会，呼吁中国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应该大力投入对中华蚕桑文明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细緻的研究，在北京、成都、山东、陕西、山西、河南、苏州、杭州、长沙、武汉等地创建或扩建蚕桑文明博物馆，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争取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四、本书在解明古蜀王国蚕桑文明的同时，也解明了古蜀王国的驱傩文明、玉文明和青铜文明，并与中原文明进行了比较和诠释。特别是解明了中华驱傩文明的历史沿革及对周边地区与国家之影响。

五、本书也同时解明了古蜀王国消失之谜与邛人、笮人消失之谜，对古蜀王国蚕丛族裔及邛人、笮人在南美洲的历史遗迹，进行了比较研究，给关心中国考古、历史和民族源流问题的读者提供了诸多的历史证据和广阔的思维空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个无冠盖的“北京闲民”的学术“客串”，已经超出了以往考古学者所应该遵循的固定规范的考古程式，明显带有非专业性的尝试考古的特征。虽然在治学规范上极心投入和运用“考据功夫”，尽力避免不守“常规”的随意“大猜古”，但因受考古学识和能力的局限，错误定会在所难免。为此，祈请各方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凡 例

一、本书是一位非考古文博专业者，自诩为“北京闲民”所作的纯属学术“客串”之作，题名《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全书对原古蜀王国统辖地域以内所属“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及其他相邻的古蜀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所展现的古蜀王国文明，做了全面考察研究和全新解读，着力于为古蜀王国的蚕桑文明、玉文明、青铜文明、驱傩文明、雩祈文明、兵器文明正名，为中华文明肇迹（起源）说正名，为古蜀王国的历史定位问题正名。

二、本书所有引据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出土文物的图版资料，主要采自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考古研究机关与学者所公开发表的论著及附载的图版资料，同时，也引据诸多的中华古籍文献和图版资料，并皆随文注明来源与出处。

三、本书的写作动机，缘于近20餘年间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学者和近10年间金沙文明考古研究学者及其中少数学官精英，他们反复传播的“三星堆大猜想”、“金沙大猜想”的种种离奇虚幻之说，激发了一个“北京闲民”的学术“客串”之情，而涉足“旁门”神秘之区，写成一本与众论相左、“背道而驰”的著作。

四、本书最凸出的与众论不同的特色，是在论题的设置和演绎性的考察论证上，特别注意保持与遵循“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出土文物所形成的最原始的“物以类聚”的“文物链”（或称“文物全宗群”）的基本构成之原状，尽可能寻找出各类文物原本固有的内在联系与相互连结的等第关系。“北京闲民”认为，如此考察论证才能够最切实际地全面揭示与展现古蜀王国的文明肇基的历史。因此，必须原原本本地恰当地引据某些作为第一见证人的考古权威学者或考据者们具有“震惊世界”与“轰动效应”的解说之词，据此才便于表述出笔者（北京闲民）全新的考辨论证之说。

五、本书为了凸显出“北京闲民”对每项文物的考辨解说之词，特别用方框线圈出。这样处置既可以凸出解明每一件或每一组群文物的原始用途与本义，又能够便于在正文里面进行充分的系统连贯的考察论证。而在当今已出版的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的各种论著中和两所博物馆展品的解说之中，一些专家学者和学官精英们却往往忽略了所有出土的古蜀王国历史文物最奇特与最明显的“文物链”的基本构成状况与相互连结之关系。因此之故，他们所做的考察论证，除了“大猜想”的说词以外，所有考据论证的文物都凸显出彼此孤立，缺乏对应和联系。这对读者与观众来说，只能起到表面性的新奇趣味引导，而无法全面系统地观察、了解与评价古蜀王国长江江源文明，更不可能公允地展现古蜀王国长江江源文明在华夏文明中所做出的最凸出的多方面的历史贡献与其所处的具有文明摇篮之称的最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与夏商周黄河流域中原文明原本所固有的同根同源之渊源关系。

六、本书所考察论证的古蜀王国文明，总称之为长江江源文明，其中最集中而凸出的为蚕桑文明、玉文明、青铜文明、驱傩文明、雩祈文明、兵器文明等等；古蜀王国所统辖地域范围以内遗存于地下的“文物链”，能够全面地充分有效地证实是名实相符的华夏文明肇迹，最核心、最原始、最本源的发祥地。这完全是由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及其周边众多遗址所有出土文物所构成的多种类的“文物链”而凸显出来的，而按其最原本的用途与意涵来辨析，可以得到确实的印证：再次全面地展现了周礼制度的辉煌。

七、本书不仅可以有力地证明，周礼制度肇始于古蜀王国所统辖的地域，而且也证明了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先生於百年前出自《馗书·序种姓》一文中所创建的“独中夏王迹，基陇坻、华山间，非自殊方东度亡繇”之说，完全符合华夏以内的古蜀王国历史遗存的实状。同时也进一步地证明章氏所引据的汉司马迁所撰《史记·五帝本纪》，及《世本》、《公孙尼子》、《六国表》和汉扬雄撰《蜀王本纪》以及伏胜《尚书大传》等古籍及其解读之说，亦是符合古蜀王国的原本历史与地理的实状。因此，可以提出肯定的结论：古蜀王国统辖地域范围以内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及其周边的古蜀文化遗址出土的多种类“文物链”，已经能够确实而有力地证明古蜀王国统辖的长江江源地域是华夏文明最本始的发祥地。随着古蜀王国文明考古发现的不断扩展和考古研究的更加深入和成熟，必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更广泛的实证。

八、本书所考察论证的古蜀王国的历史文物，尽可能地进行综合归类研究，并且要进行溯源性的系统解说，力求给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系统的、最古老的具有探本溯源性的而且不易多得的基本知识。因此对古蜀王国文明所包括的蚕桑文明、玉文明、青铜文明、驱傩文明、雩祈文明、兵器文明等“文物链”以及所蕴涵的礼仪制度和对后世各朝代的影响与传承关系，均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论述。同时，对某项同等形状、数量较多的同类性文物尽可能地进行排列对比，并列表编序说明；为了有凭据地展现古蜀王国文明对周边地域文明的传播与影响，甚至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跨地域的同物同类同形同质性的追踪溯源研究，尽可能地察验并揭示出彼此所存在的同根同源之关系，列举出最直接的实物图形证据。

九、本书系统地揭示了当今某些学官精英学者所发动的“三星堆考古大猜想”、“金沙考古大猜想”，对古蜀王国文明造成了“重度污染”，严重曲解了古蜀王国文明，抹杀了古蜀王国文明在华夏文明中所凸显出来的重要历史地位，完全被某些考古精英肆意编织的20余种“崇拜说”（眼睛崇拜、手崇拜、鸟崇拜、主神崇拜、树崇拜、鸟鱼崇拜、社树崇拜、地母崇拜、神山崇拜、太阳崇拜、月亮崇拜、自然崇拜、原始崇拜、蚕丛崇拜、祖先崇拜、始祖崇拜、灵神崇拜、英雄崇拜、鱼崇拜、龙崇拜、龙王崇拜、天神崇拜、灵魂崇拜、泛灵崇拜、鸟母崇拜、惶恐崇拜、大石崇拜、图腾崇拜等等）以及各种“攀龙附凤”式的“西亚近东文明东渐（古蜀国）”说所掩盖，被全盘“巫化”和“西化”，似乎古蜀王国文明完全来源于各种“崇拜”与“西亚文明”，似乎古蜀文明亘古以来就患有“软骨症”，全要靠“外来文明”给“补钙”；然而这些学官精英学者花费二十馀年之功

力，时至今日却始终拿不出任何一件具有说服力的实体证据。

十、本书为了正本清源，正确阐明古蜀王国所肇基的中华蚕桑文明，有必要对国内某些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学者和少数有影响的学官精英学者所强加于蚕桑文明的各式出土文物之上的故弄玄虚、耸人听闻、误人惑世的种种虚妄掩盖真实、奇谈怪论扰乱纯诚之伪说，作出比较系统的揭示和点评。从而确实有据地展现出古蜀王国的蚕桑文明是中华蚕桑文明最本源的发祥地。而古蜀王国的蚕桑文明又是古蜀王国玉文明、青铜文明、驱傩文明等项文明的核心基础。这是因为本书所论证的古蜀王国蚕桑文明，不仅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成系统的蚕桑“文物链”作实证，而且还有自汉魏以来各代古籍文献记录的原古蜀王国统辖地域以内的蚕桑实物之发现和近现代以来先后出土的特别能够凸显古蜀王国蚕桑文明的典型文物作支撑。

十一、本书对“金沙遗址”出土各种文物的考证，充分有效地利用和验证了在金沙村地方古蜀人举行大雩祈雨活动所形成的“文物链”，因此能够全面细致地并且雄辩有据地展现了古蜀王国的大雩祈雨的基本状况、规模与礼仪制度。而此项大雩祈雨的仪式、所应用的道具和祈雨的日程、参加人员的组成与规模等等，皆为周边邻国及后世各代所沿袭和传承，直至近现代。从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所构成的大雩祈雨的“文物链”来检视当代金沙文明考古研究学者所作的“大猜想”解说之词，可以证明他们完全背离了古蜀王国举行大雩祈雨礼仪活动所有遗存下来的大宗历史遗迹（即“文物链”）的实际。因此，当今之金沙学者对金沙博物馆内展品之解说，明显存在“是非淆乱”之误导。

十二、本书所考证的古蜀王国长江江源文明，处处事事都凸显出古蜀王国地域是华夏文明最本源的发祥地，与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黄河流域中原文明，形成同根同源之亲缘关系。然而古蜀王国的消失和古蜀王国周边相邻族属部落的消失，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为此，本书特辟专章及在相关章节中再次进行溯源性的追踪考察论证，有根有据地展现了古蜀王国后裔迁徙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历史状况，以及与阿兹特克人兵器装备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古蜀国人后裔与中美洲阿兹特克人的某种历史渊源关系，值得我国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人类学、民族学等学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为此，笔者特别在《第十章 古蜀王国消失之谜》之后作成《羌族板楯蛮迁徙美洲历史溯源录》一文作为附录。

十三、本书为了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和深入细致地观察与了解以古蜀王国蚕桑文明为本源的中华蚕桑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对世界蚕桑文明史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特别吸收与利用前人的蚕桑著作和研究成果，编纂五个专题作为附录，题名《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艺文编》。

目 录

序	3
凡例	7
绪论	1
一、古蜀王国的基本史事与地理环境	2
二、古蜀王国消失的时间与原因	5
三、古蜀王国的蚕桑业是华夏蚕桑业之本源	8
四、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经过	12
五、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寻根揽胜”	16
附录：三星堆文明考古学者的“西亚近东文明东渐”说 ——“集体大猜古”的典型事例	23
 第一章 青铜树落九扈生臂手固有桑柘之树 ——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青铜桑柘树正名	29
（一）三星堆考古研究学者解读“大青铜神树”之各说	29
（二）古蜀王国与黄帝及其后裔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	37
（三）古蜀王国与中原诸侯之关系	39
（四）古蜀字与蚕桑文明之关系	42
（五）古蜀王国的周边古国亦是蚕桑业发达地域	43
 第二章 青铜女穿蚕衣大手结凸显蚕神之像 ——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青铜立人像正名	59
（一）三星堆考古研究学者解读“大青铜立人像”之各说	59
（二）应该为大青铜立人像（蚕神）正名	61
（三）大青铜立人像的服饰与“大手结”是古蜀王国后妃等亲蚕躬桑礼仪制度的 最典型标志	68
（四）“天驷驮载祭先蚕躬桑坛飨祀礼仪”是凸显古蜀王国蚕桑文明的最高智慧 与结晶的工艺造型	78
（五）中国历代王朝亲蚕躬桑典礼之盛况	81
（六）中华蚕桑文明对朝鲜日本的影响	96
（七）三星堆文明考古研究学者没有能够破解大小青铜立人像的真实身份	98
（八）《后汉书·舆服志》之服饰源于古蜀王国	100

第三章 古蜀王国的驱傩文明	104
(一) 古蜀王国驱傩文明的历史最悠久.....	104
(二) 川燕两地考古精英学者的“超凡新说”.....	107
(三) 古蜀王国驱傩活动溯源.....	113
(四) 中国历代王朝驱傩活动的盛况(以唐朝为典例).....	119
第四章 古蜀王国的金杖尊罍等器物与礼仪制度之关系	124
(一) 射鱼金仗、金冠带与射鱼盛典之关系.....	124
(二) 燔柴典礼的象牙来源.....	132
(三) 古蜀王国的墓葬制度与出土文物之关系.....	134
(四) 古蜀王国出土文物巴蜀地域墓葬及随葬品与中原地区之比较.....	137
(五) 燔柴之礼与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出土文物火烧痕迹之谜.....	139
(六) 古蜀王国的金箔虎金鱼符金蛇符尊罍与礼仪制度.....	142
第五章 古蜀王国的玉文明再现周礼辉煌 ——关于古蜀王国祭品中的玉珠玉璧玉璋玉琮玉戈等器物的解说.....	151
第六章 古蜀王国的兵器文明	194
(一) 古蜀王国的青铜鸛版与大射礼.....	194
(二) 古蜀王国的盾牌——櫓楯与菱形眼形盾.....	211
(三) 古蜀王国的铜殳霹雳棒与中美洲古蜀人后裔阿兹特克人兵器样式之比较.....	222
(四) 古蜀王国的车铃与旗铃.....	225
第七章 古蜀王国的雩祈文明	236
(一) 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所展示的雩祈文明.....	236
(二) 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在雩祈典礼上的实际应用.....	253
(三) 古蜀王国蚕丛族裔、杜宇族裔迁徙到美洲以后仍然传承中夏建坛举行 大雩祈雨的礼仪制度.....	281
第八章 三星堆文明研究学者“考古大猜想”典范事例集锦	288
甲、“文史两栖”精英学者虚幻玄秘的“三木”(扶桑、建木、若木)说.....	288
乙、学官精英学者“三星堆文明”之各说.....	296
第九章 古蜀王国文明遭到严重曲解	307
(一) 从唐肃宗时楚州刺使进献的皇后采桑钩谈起.....	307
(二) 古蜀王国文明遭到严重曲解与污染.....	309
(三) 全面“巫化”古蜀王国文明的各种“崇拜”说与“图腾”说.....	317